

试论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演变

田兵权¹ 梁璐²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2. 西安外国语大学 旅游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近代中国在国外资本主义侵略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传统农村经济开始逐步解体, 与此同时, 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了某种新的变化, 集中表现在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 (即纺与织的分离)、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解体 (即耕与织的分离) 和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这说明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市场轨道, 从而导致被迫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研究这一问题, 对于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均有理论与实际意义。

关键词: 中国近代; 农村经济; 解体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 F1; F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0) 01-0069-05

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方面, 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 当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 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等相继开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步入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时代后, 古老的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必然要寻求海外市场, 以暴力手段占领并掠夺殖民地, 以建立起它们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就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口中的一块肥肉。在英国远征军的坚船利炮、不法商人的鸦片输入和商品贸易以及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的冲击下, 中国这座古老而腐朽的大厦岌岌可危,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已经濒临解体的边缘。

一、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结构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经济以农村自然经济为主体, 农村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 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使农产品实现商品化, 进入商品市场。只有当农产品有所剩余的时候, 才被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 以换回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资料。这种经济结构在中国的广大农村, 主要表现为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即“耕与织”、“农业与副业”的两个紧密结合。

清代中期以后, 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运行模式, 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现象十分严重。嘉庆十七年 (1812), 全国耕地面积大约有 8 亿亩,^① 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皇族、寺院和各级官僚手中。道光年间 (1821—1850) 的大学士琦善竟然拥有土地 256 万多亩。^② 土地的高度集中, 迫使农民失去土地, 转而向地主佃耕, 他们除了必须向地主缴纳收获物一半以上的地租以外, 还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这种经济压迫促使小农业与小手工业进一步密切结合。农民们必须在农业生产的同时, 从事家庭手工业劳动, 以满足菲薄的农

作者简介: 田兵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西北大学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梁璐, 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区域文化研究。

① 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第117—120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9页。

食所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严重阻碍社会分工、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当时清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这便使沿海地区已经产生的市场经济因素,尽管仍在继续成长,却没有条件实现从手工业向社会化大工业的转化。所以,直至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封建自然经济。

从清朝末期广大地区传统农业的发展情况看,仍未见到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即没有出现经营地主和资本主义经营的富农,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出售以谋取利殖,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十分低下,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并不紧密。就是说,内陆地区的农业生产仍处于传统自给自足的状态下,这种情形一直到辛亥革命前未见有明显改观。

二、中国农村传统经济结构的初步解体

西方资本主义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入侵,在客观上必然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导致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经过两个主要过程:首先是机制品(洋纱)的输入,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逐步分离,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首先开始了解体的过程;其次是洋布输入以后,由于其物美价廉,质量远远高于中国的土布,受到人们的喜爱,购买者逐渐增多,土布也相应地退出了市场,于是耕与织相分离,也就是使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小生产发生分离。

洋纱代替土纱的过程,首先是在沿海通商口岸及附近的农村中开始的。手工纺纱与手工织布的分离有这样几个主要原因,首先,进口洋纱价格低、质量高,土纱价格高、质量低,因而不堪一击。鸦片战争以后的2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近代化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使得洋纱产量大幅度增加,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洋纱的成品价格逐年降低。从资料看,1872年到1890年间,洋纱的价格最低时曾下跌1/3左右,远远低于土纱的价格。如1887年牛庄市场上每包洋纱大约售银57两,而同等数量的土纱却要售银87两左右,^①两种棉纱的价格差高达30两之多。同类商品的竞争有两个主要手段,一是商品价格的竞争,二是商品质量的竞争。洋纱和土纱之间明显的价格差距,尤其是土纱的质量远不及洋纱,二者市场竞争力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从纺织布匹的操作过程看,洋纱更大大简便于土纱,这又是不可忽视的一种优势,此时作为商品购买者的织户,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质高价低的洋纱,而不会购买质次价高的土纱。这样,土纱被洋纱所取代就在所难免。其次,纺与织相分离还有棉花价格上涨的原因。具体而言,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继续引领世界棉纺织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棉花作为原料,除美国棉花、印度棉花以外,也从中国进口一定数量的棉花。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纺织业获得较快发展,也需要中国棉花作为原料,于是中国棉花出口量不断增加。据资料统计,1868年中国棉花出口总量为38 141担,1888年增加到202 546担,1892年增加到576 155担,1895年出口总量就增加到896 096担。^②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棉花出口量翻了24倍,导致棉花价格持续上涨。这就使手工棉纺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方面,作为原料的棉花价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手工生产出来的土纱相对进口的洋纱价格更是居高不下,反而是洋纱的价格一路下跌,一是棉花价格高,二是洋纱质量高价格低,三是土纱质量低价格高。在这种情况下,手工纺纱迅速走向衰落,手织业者选择购买洋纱织布,与机织业进行艰难的抗争,纺业与织业发生分离初见端倪,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同时,洋布也开始在中国销售,这个过程稍晚一些,洋布排挤并最终代替土布的关键所在,仍然是物美价廉。洋布最初只是“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作起所需衣服来,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③。洋布幅宽、质细、好染色和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63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18页。

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80页。

色彩光艳、便于裁剪衣服等优点成为富人们购买的另一原因。由于洋布价格十分低廉,不仅仅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富裕者,就是生活比较拮据的城市居民,甚至广大农民也不愿意再穿用那种价格高质量差的土布。例如 1871 年中部地区的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洋布比他们自己织造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贸易的普遍恢复和扩张,洋布价格的低廉,国内情况的改善,使得中国农民能够购买得起洋布,其结果,就是贸易的增加。^①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则“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②。可见,作为农业副业的手工棉纺织业已走上没落之路,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开始分离,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由于中国土地面积十分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非常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所以,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中,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也相应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形成这样四个层次:一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自然经济的解体速度较快、范围较大,社会各阶层对洋纱和洋布的认可度比较高,许多地方的纺车和织机基本被闲置,农业生产与市场发生了更多的联系,以至出现了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手工业。二是中部沿江地区,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较高,仅次于沿海地区,购买洋纱和洋布的农民不在少数,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沿江的几个大中城市被开放为商埠,外国商品输入该地区的数量大增,土布所占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三是在内地的广大城乡,自然经济的解体在时间上要晚得多,大约到 19 世纪 80 年代,洋纱洋布仅有少量输入到内地,并没有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四是边远、偏远的地区或山区,外国商品的输入就更少,仅是少数富裕阶层得到少量洋布等外国商品并作为奢侈品,自然经济结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但从总体上看,自然经济解体的趋势依然不可阻挡地在中国农村发展着。

三、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更多的通商口岸,也获得了倾销商品的各种特权。于是,外国势力从沿海深入到沿江和内地,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内的大量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各地城乡。到 19 世纪 90 年代,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均遭到严重摧残,沿海沿江地区较之内地情况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外国进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大幅度增加,倾销地区的范围更加扩大,同时中国丝、茶等大宗商品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也不断增加,由于英人赫德、李泰国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致使出口商品的销售价格不断下跌,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开始逐渐处于不利地位。在国内某些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城乡各地出现生产凋敝、经济萧条的状况,许多手工业工人和部分农民破产失业,其中的一部分成为外资企业和洋务企业的雇佣工人。

外国商品主要是轻工业产品在中国大肆倾销,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在自然经济轨道上正常运行的社会生活发生变故,新旧经济因素在对抗中发生关系,这就为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导致在国内沿海地区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加快。自然经济的解体促成近代商品市场的形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定条件。

自然经济的解体必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 19 世纪 60 年代之后,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商品性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在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大量掠夺中国的农产品,使中国农业生产开始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轨道,农产品的出口量也相应迅速增加。如蚕丝、棉花、大豆、花生等农产品的出口量在鸦片战争以后逐年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反过来又促进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办了船舶修造厂、农副产品加工厂和食品等轻工业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20-221 页。

②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715 页。

企业。这些工厂的建立,一是吸纳了部分破产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二是为当地农副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市场,三是向中国传入了近代企业的生产方式。从此,伴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机器生产在中国露出了端倪。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以官督商办的方式开始经营机器生产企业,也有民族企业从事纺织业和食品业,这些工厂的建立增加了对棉花、粮食、烟草等农副产品的需求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商品性农副作物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由于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农民不得不与市场发生更多更直接的关系,他们出卖部分农产品,到市场上购买那些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满足生产和生活所需。商品性农业进一步获得发展,农民无论愿意与否都必然被卷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体系之中,这是近代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当然,中国是一个土地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并没有从整体上彻底摧毁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事实上在广大内地农村经济仍然按照过去的轨道运行着,自然经济的根基并没有被彻底动摇。

四、中国近代农村市场化的进一步加深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260余年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法规,刺激了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热情,使“振兴实业”与民主共和一样,成为一股社会潮流。

从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在近代的演变看,它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逻辑结果,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背景下实现的。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被卷入外国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农民和农业生产与市场发生了更多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会无形地利用自身具有的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反过来对农民和农业经济的结构与发展趋势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直接表现为农民们对农作物种植品种的自觉调整。中国自先秦以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农村经济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尽管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局限,但这毕竟反映了传统自然经济下的农民和农业生产,改变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立情绪。

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和农村经济对商品市场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当时农产品的商品化,首先是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而引起的,它取决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变化,其次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农业原料的需求,它又取决于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主要是农产品的商品化,因而带有半殖民地经济因素的显著特征。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中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对作为主要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加,此类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市场利益成为农民以及农村经济选择的主要驱动力。只要能够赚钱,农民就会作出相应的利益选择。例如种植鸦片可以谋取巨额收益,农民们争相种植。1860年以后,陕西开始征收鸦片税,罌粟的种植取得合法地位,西安府及陕南陕北各县广泛种植罌粟。各地“烟苗广植,无地无之,惟其处处繁滋,遂至人人癖嗜”^①。广植罌粟,必然占据良田沃土,侵夺农田,造成粮食生产的锐减。清朝地方官府执行清廷“寓禁于征”的政策,其目的是想以生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结果不仅未能抵制住“洋烟”的大量进口,反而促使更多的人吸食鸦片,从而成为瘾君子。在“洋烟”的带动下,西安府土产鸦片竟猛增至洋烟的10倍以上。

农民追求单位劳动时间和单位种植面积收益的最大化,这无可非议。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会种植或者养殖什么。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他们只能顺应潮流。关键问题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能力。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变化需要耕作技术的进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只为了能够维持

^① 樊增祥:《樊山公牘》卷1《复边中丞禁烟禀》,广益书局,1912年,第2页。

农家的温饱。当农民和农村经济与市场发生了比较紧密的联系以后,农作物的产量及其经济收入的多少,就成为农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传入中国,在沿海沿江的农村陆续传播开来,农作物品种得以改良、农业耕作技术得以改进,其总的发展趋势就是农村经济更加适应工业生产的要求,因而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加。

戊戌变法期间,一部分知识分子关心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京师和各地相继组建了农学会或类似团体,成立农学堂、建立农事试验场,专门从事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活动。他们积极宣传介绍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翻译相关书籍,试图通过对西方农业科技的传播,改变中国农业经济的落后面貌。以棉纺织业的发展为例,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兴起以后,急需大量优质原棉为纺织原料,而中国种植的亚洲棉质量差、纤维短,不能适应机纺要求,因而每年必须进口大批美国棉。不仅价格高而且受制于外人。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引进美国陆地棉,以供纱厂纺织原料之需。清政府农工商部也从美国引进大批陆地棉品种,分发给各地试种,美棉的种植在中国各地出现了明显增长的势头。以陕西为例,西安地区的棉花种植开始普及是在左宗棠督陕期间。当时他要求修通西安至潼关的大路,两侧植种棉花,提倡民间植棉,实现以棉代烟的目的。他主持编印的《种棉十要》及《棉书》对棉花的广泛种植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到19世纪末,外国棉种渐次传入西安地区,俗称“洋花”。洋花产量较高,很受农家欢迎,故而逐渐在西安地区普及。到宣统年间,洋棉的种植比乡棉的面积有较快增加。由于引进外国棉花良种,加上官方督导鼓励,西安地区的户县、长安等县棉花产量逐年上升,并远销外地。由于棉花产量的增加及中国棉业市场受外国资本的控制,棉花价格极不稳定,而且整体价格呈下跌趋势,严重影响了西安地区棉花的生产及棉农的生计。在广植棉花的同时,西安地区还提倡蚕桑事业。1890年,陕西布政使颁布《蚕桑简编》,令乡民如法栽种。由此,丝绸纺织业随之兴盛。缫丝、纺织业的兴起,反过来又促进了桑蚕业的发展。

近代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发展,一方面增强了农民和农村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依赖。另一方面,使与市场化相联系的市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一批近代商业城市随之兴起,城市的商业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尤其是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一些地域性工商城镇得以迅速崛起,并形成区域性市场网络。以陕西为例,首先城镇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如陕西渭南,明代嘉靖年间有市镇16个,到雍正十二年(1734)市镇增加至30个,^①到光绪十八年(1892)市镇又增加到36个。^②其次,市镇的经济职能进一步强化,规模较大的专业化的工商业城镇大量出现。如昔日的粮食集散地三原县鲁桥镇,发展成为有20多条街巷,居民商店500余户的渭北闻名的粮食市场,渭北、耀县、富平、三原的小麦多集于此交易;^③长安的引镇,周至的终南、马召等因地处终南山山口而发展成为著名木材市场。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商业市镇集群化的趋势,南郑县第一大镇铺镇就是一个代表。^④铺镇南临汉江,距汉中市水运码头“麻柳湾”仅有7里之遥,因交通便利而发展为商业市镇。但是,铺镇并非一个孤立的商业市镇,在其东、南、北三方有几个大镇环卫:东面有新浦、柳村镇;东南有上元观;南面有山口子;它们与二里坝北面的武乡、文川等一起构成铺镇的卫星集镇,成为近代农村城镇活动的典范。作为近代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陕西尚且如此,全国尤其是沿海沿江等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可见一斑。

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是极其缓慢的,这是由近代中国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的,它不是仅仅通过经济方式就可以改变的。

责任编辑:李 华

① 渭南志编纂委员会:《渭南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13-314页。

② 严书麟:《新续渭南志》卷1《舆图志》,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

③ 徐志祯:《解放鲁桥镇侧记》,载政协陕西省泾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泾阳文史资料》第5辑,1990年内部发行,第33页。

④ 张作华:《解放前铺镇工商概况》,载政协陕西汉中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汉中市文史资料》第6辑,1988年内部发行,第43页。